

论限界是非根本基是清划习学

—“划清八个基本界限研讨班”
辅导报告材料汇编

北京地区军队院校协作中心



国防大学 2 062 2563 6

前 言

北京地区军队院校协作中心，于1996年4月22日至26日，在国防大学举办了一期学习贯彻江泽民主席划清“八个基本界限”指示研讨班。来自北京协作区22个成员单位和石家庄、大连、西安、南京、长沙、蚌埠等6个协作区的8所院校共30个单位50余名政治部门和教研室的同志参加了研讨班。其间，除组织大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八个基本界限”进行了研究探讨外，特意邀请《求是》杂志主编贾生华、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南生和国防大学副校长侯树栋等同志分别就“八个基本界限”有关内容作了专题辅导。

为使更多的同志了解和掌握党的宣传部院校政治教育局的指示，我们于研讨班结束后，根据录音把几位专家的报告整理出来且汇编成册，赠送各兄弟协作中心和全军院校，以作为我们对政治理论教学乃至军队院校思想政治建设的一点支持。

在录音整理和该书的印刷中，得到了国防大学教保部、图书馆和参加研讨班部分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北京地区军队院校协作中心办公室
一九九六年六月

目 录

- 一、关于划分马克思主义和
反马克思主义界限的几个问题** 邢贲思 (1)

- 二、划清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
成分共同发展与私有化的界限** 吴树青 (26)

- 三、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议会制
民主的界限** 刘 吉 (64)

- 四、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划清唯物论与唯心论的界限** 侯树栋 (96)

关于划分马克思主义和 反马克思主义界限的几个问题

中央党校副校长 邢贲思
《求是》杂志总编

今天我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划分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坐标；第二个问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第三个问题是以后邓小平理论为坐标必须反对错误的思想倾向。

一、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必须有一个正确坐标

当我们谈这个问题时，有一点必须明确，即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发展的科学，它诞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今已经一个半世纪了，其间马克思主义经历了若干个发展阶段。从诞生至今的 150 余年中，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虽然至今还适用，但确有相当一部分原理，由于时代的变迁、实践的发展有了很大变化。所以要划分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就有相当的难度。这里就有一个究竟选择什么样的坐标的问题，难就难在这里。既然马克思主义是

一门发展的科学，所以就不能把它凝固化，把它当成僵死的教条。对它的真理性的考察必须放在一个历史的长河当中，也就是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时一地的某些论述作为依据，也不能单拿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某些观点、理论，某些论述作为永久性的坐标。即使是那些至今仍然适用的原理也必须结合新的情况加以发展，而不能照抄照搬。这才是一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此我念一段邓小平同志的话，虽然长一点，但我认为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很有帮助。邓小平同志在《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有一大段话，讲的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去世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说：“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

292页)这段话说得清清楚楚，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来对待，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非犯错误不可。

下面看一看马克思主义在形成时期的一些论述，哪些是普遍真理，至今仍适用，我们一定要继承、坚持；哪些部分失效，部分还能用，我们应怎样根据新的情况，新的经验加以补充、发展；哪些完全不适用，不应在今天继续加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为什么会有完全不适用于今天的实践的呢？这并不奇怪，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预测，社会主义是在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搞成功的，所以对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论述都是以此作为出发点的。但后来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并不是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搞成，而恰恰是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象中国、俄国这样一些国家搞成功的。所以出现了许多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预测不同的情况，如果当年的俄国、中国，不能按照自己的国情，结合新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肯定会走很大的弯路。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完全成熟的国家首先搞成功，因此革命成功后在所有制方面实行的是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直接占有，不允许有其他的所有制存在。这一原理就其坚持公有制这一点而言还是适用的。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但是要作出新的补充和发展。因为后来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是在落后国家先搞成功，这样的国家革命成功以后，必然会有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历史时期，想快也快不了，快的结果是破坏生产力。我

们自己有这种体会，当年的苏联也有这种情形。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分析过当时俄国的经济成分，明确地提出俄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宗法式经济、小生产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前毛主席对我国的经济成分也做了科学的分析，提出当时的中国也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当然这五种经济成分与当年俄国的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一个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可能象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立即做到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所以，公有制这个论断总体上虽是正确的，但是在后来的不同国家的实践当中必须结合新的情况做出新的发展，否则就会犯错误。俄国有过这种反面的经验教训，我们也有。又比如分配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讲了很多，尤其是马克思在1875年出版的《哥达纲领批判》中讲得很详细，提出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要实行按劳分配。又讲按劳分配实质上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权力范围，它实行的仍是等价交换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全部分配形式可以采取按劳分配。后来，我们自己的经验表明，按劳分配只能是一种占主体地位的分配形式，不能作为社会的唯一分配形式，还必须辅以其它的分配形式。因为在我国有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是其中占主体地位的一种所有制形式，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非公有制的经济成分，所以就必然产生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格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又比如，关于计划与市场的问题，马克思、恩

格斯当时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市场。因为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直接占有，社会就有可能把整个生产的运行纳入一个统一的计划范围，不需要通过市场的机制来发挥作用。再比如货币，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设想是社会主义应当取消货币，取消商品流通。社会把产品直接分配给社会成员，不需要社会成员相互之间以商品交换这种形式通过市场来实现交换劳动。这个论断后来经过实践证明，对包括俄国、中国这样一些国家都不适用。邓小平理论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科学地阐明了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市场机制都是必不可少的。

从以上简单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许多论述，至今还适用，有一部分基本适用但还要加以补充和发展，而有些就不适用了，比如消灭货币。这就说明，我们要区分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坐标一定要定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上，在我们中国来讲，就是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坐标，这个理论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结合了新的实践经验，特别是结合了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当然邓小平理论本身也是发展的，也不能够把它凝固化。关于这个问题，江泽民同志有过重要的论述。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江泽民同志讲了两段重要的话，第一段是这样的：“改革开放十五年来，我们党在理论上取得的最大的收获，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还有一段就是：“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一再表明，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反过来也一样。总书记的这段话讲得非常明确。所以说，划分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必须以当代马克思主义为坐标，也就是必须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坐标。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在党内学了很长时间了，不少同志也发表了很多论文，特别是中央宣传部起草了一个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纲要，系统地进行了论述。今天我讲一点自己的想法跟同志们一起研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本身很丰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述。比如说《纲要》的概括，十四大报告的概括，这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概括的。我自己认为最主要的要把握三点，简单地讲就是，一个精髓，一个本质，一个核心。

一个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就是辩证法

和唯物主义的统一。什么是解放思想？什么是实事求是呢？我们还是以邓小平同志自己的话来加以领会。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中讲：“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约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叫做解放思想，所以说解放思想不是胡思乱想。什么叫做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讲：“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关于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相互关系，邓小平同志也有一段话，这是在《坚持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说的。他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结合，就是实事求是。”这里有一点要说明，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主观与客观的符合、理论与实际的符合，这个客观、这个实际本身是变化、发展的，而不是静止不动的。即我们的主观要符合一个处在动态中的实际，不是去符合一个处在静态中的实际。我们的理论要符合不断创新的实践，而不是去符合机械重复的实践。所以这样的主观和客观的符合、理论和实践的符合既是辩证法，又是唯物论。光强调理论符合实际、主观符合客观还不够，还要强调，我们讲的实践是发展了的实践，我们讲的客观是处在动态中的客观。邓小平同志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间的关系讲得非常透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能不能坚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是我们能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一个根本的思想保证。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就不难理解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伟大意义。“四人帮”刚粉碎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经济几乎达到崩溃的边缘，各项事业遭到破坏，特别是人们的思想十分混乱。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很难辨别清楚。当时我们百废待兴，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抓，但千头万绪，究竟抓什么？邓小平同志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首先抓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所有问题都不好解决，如工作重心转移、重估文化大革命、平反冤假错案等，你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按照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办事，能解决得了吗？我们多少年来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势力，习惯是一种最难改变的力量，何况全党全国人民多少年来就是在这种观念下生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好象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多少年来就是这么认识的。要转变这样一种状态，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又比如给文化大革命下个评语，文化大革命是好得很还是一场灾难？这个问题今天看起来也已经变成了常识，但在当时要做出一个全面否定的结论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行吗？因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涉及到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晚年，这在当时是一个禁区，是

一个很大的禁区。再比如一大批冤假错案，象彭德怀、刘少奇这样的错案，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能翻得了吗？一般人的案子要翻已经难度不小，何况彭、刘的案子是毛主席老人家定的，当时叫“铁案如山”！要把这些案子翻掉谈何容易！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行吗？因此，千头万绪这么多工作要做，但首先要端正思想路线。不端正思想路线，就不可能解决上述这些问题，而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只有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扫除诸如“两个凡是”这样的思想障碍，才能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过去经历了那么大的挫折，根本问题就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上认识不清楚或者说是不完全清楚，所以走了弯路。邓小平同志讲，要解放思想，包括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上也要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的话，“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连提出都不可能。因为人们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出文化大革命的困境，才能在理论上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就叫“一个精髓”。

第二，要把握一个本质，也就是邓小平同志概括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共有五句话：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里要做一点解释：有的同志讲，为什么邓小平同志没有讲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没有讲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些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别的文章里反复讲过，讲了多遍了，

而且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全党没有分歧，要坚持社会主义当然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当然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问题是光有这些，够不够？是不是就已经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了？邓小平同志思想深刻的地方恰恰在于他认为仅有这些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他说，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做社会主义。这就说得很明确了，公有制建立起来了，按劳分配的制度建立起来了，政权已经是人民民主专政了，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没有实现共同富裕，这还不能叫完善的合格的社会主义。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存在着模糊的认识。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的富是全体人民的富。邓小平同志一再讲，不要怕谈富，关键是谁富，资本主义的富是少数人的富，大资本家的富，我们讲的是全民共同的富。这恰恰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最根本的东西。“全民共同致富”的目标怎么实现？邓小平同志讲得非常明确，一个要有生产力方面的条件，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一个要有生产关系方面的条件，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由于这两个方面的保证，才有可能达到全民的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的五句话把我们从多年来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盲区，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中引导出来了。这五句话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不矛盾的。邓小平同志讲过，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

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是不能动摇的。又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所以我们不应该误解，好象邓小平同志的五句话里没有包含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其实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本身就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制度能消灭剥削吗？能消除两极分化吗？关键是我们过去认识上有盲区，有误解，没有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所以他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这是关于一个本质的问题。

一个核心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既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核心的部分，是这个理论架构最基本的东西。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如果是一座未完的话，那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石，是整个理论体系最基础的部分。关于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全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确立起来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的引导下，我们全党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以后，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首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所以我们始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同志讲，对于这一点大概现在没有人怀疑了。两个基本点也是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们几十年的建设经验、几十年所走过的道路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那么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怎样才能得到保证？没有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上的保证，没有改革开放的体制上的保证，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是一个整体，任何时候我们~~

都不能把它们割裂，使它们对立，这一点十分重要。不能一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顾四项基本原则了，连方向、道路的问题也不管了，就不讲政治了，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抛在脑后了。不能一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又忘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纲要》里有一段话对三者的关系讲得很清楚：“经济建设是各项工作的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也离不开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实现现代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当中。”关于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的关系，邓小平同志自己也有一些重要论述。比如关于一个中心离不开四项基本原则方面，他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的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的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现代化，目的是要搞好社会主义的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使全体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么我们就真是走了斜路了。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这篇文章中讲的。讲得很明确。

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改革开放的关系，邓小平同志自己也有重要论述。他讲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所以不搞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得不到保证。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他有一篇文章叫做《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很清楚地讲了改革同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的关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心很明确，两个基本点要服从、服务于这一中心，而这个中心也不能脱离两个基本点的任何一个。否则，它的中心地位也保不住，这就叫辩证法。如果说，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那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理论，则是回答了怎样建立、巩固、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内容很丰富，也很深刻。抓住了这三点不能说是抓住了全部，但可以说是抓住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主要的东西。

在这里，我想讲一讲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江泽民同志最近的多次讲话都讲到了讲政治的重要性。讲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绝大多数同志都拥护总书记的讲话。我们现在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时刻，各地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面，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但也有少数的同志，在大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对政治方面的问题有所忽视。现在提出讲政治是适时的，是必要的。但是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会见出席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的解放军代表团的讲话中所指出的，确实也有少数人，对中央提出的要讲政治不理解，或者是理解偏了。加上港台一些报纸推波助澜，造

了很多谣言，使本来一个很正确、在当前来讲也是很必要的讲话精神，在理解上产生了很多歧义，有必要加以澄清。江泽民同志在讲到为什么现在要提出讲政治时说，中央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希望大家更加坚定不移地、更加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那种误传、误导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江泽民同志又讲，我们要求领导干部讲政治，绝不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更没有任何意思要以政治代替经济。恰恰相反，是为了创造更充分的条件和提供更强有力的政治保证，确保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地把经济建设更快地搞上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在全党已经形成了坚定的共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总书记的话可谓掷地有声。港台的某些势力现在瞎起哄，唯恐我们不乱，是别有用心的挑拨。最近，江泽民同志在一次会上又一次强调，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全面地、正确地、积极地宣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求领导干部讲政治，并不是、也绝不会去搞什么运动，更不会、也绝不允许回到过去那些“左”的做法上面去。我们讲政治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各级干部按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更好地提高政治素质。做到这一点，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得更好，更加自觉，领导能力更强，使我们现代化建设可以搞得更快一点，更顺利一点。借今天这个机会我把江总书记关于讲政治的含义讲一讲，特别是在座的都是军队的领导干部和老师，更有必要把它搞清楚。首先我们从自己开始，不把领导同志的